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分科本◎历史

纪念版

古代世界的政治

[英] M.I.芬利 著



SINCE 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纪念版

古代世界的政治

〔英〕M.T.芬利 著

晏绍祥 黄洋 译



商务印书馆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世界的政治/(英)M. I. 芬利著;晏绍祥,黄洋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周年纪念版,分科本,历史、地理类)

ISBN 978-7-100-13299-2

I. ①古… II. ①M… ②晏… ③黄… III. ①政治制度史—研究—世界—古代 IV. ①D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73307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古代世界的政治

[英] M. I. 芬利 著
晏绍祥 黄洋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3299-2

2017年8月第1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1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7%

定价:29.00元

M. I. Finley

POLITICS IN THE ANCIENT WORLD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First Published 1983

Reprinted 1984 (twice, with corrections), 1987, 1989

Canto edition 1991, 1994

据剑桥大学出版社 1983 年版译出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 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出版说明

2017年2月11日,商务印书馆迎来120岁的生日。120年前,商务印书馆前贤怀揣文化救国的理想,抱持“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使命,立足本土,放眼寰宇,以出版为津梁,沟通中西,为中国、为世界提供最富智慧的思想文化成果。无论世事白云苍狗,潮流左右激荡,甚至战火硝烟弥漫,始终践行学术报国之志,无改初心。

译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即其一端。早在20世纪初年便出版《原富》《天演论》等影响至今的代表性著作,1950年代后更致力于外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经典的译介,及至1980年代,辑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汇涓为流,蔚为大观。丛书自1981年开始出版,历时三十余年,迄今已推出七百种,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学术翻译工程。

丛书所选之书,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皆为文明开启以来,各时代、各国家、各民族的思想与文化精粹,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丛书系统译介世界学术经典,



引领时代思想,为本土原创学术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文化滋养,为推动中国现代学术和现代化进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为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 120 周年,我们整体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 周年纪念版的分科本,延续传统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石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学术经典著作,既利于文化积累,又便于研读查考,同时向长期支持丛书出版的译者、编者和读者致以敬意。

两甲子后的今天,商务印书馆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时间节点上。我们不仅要铭记先辈的身影和足迹,更须让我们的步伐充满新的时代精神。这是商务人代代相传的事业,更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始终紧密相连的事业。我们责无旁贷,必须做好我们这代人的传承与创造,让我们的努力和成果不仅凝聚成民族文化的记忆,还能成为后来人可以接续的事业。唯此,才能不负前贤,无愧来者。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7 年 5 月



芬利与古典世界历史研究

生平与主要著述

芬利(Moses Finley, 1912—1986)是 20 世纪西方最有影响的古史学家之一,初名芬克斯坦因(Moses Israel Finkelstein),1946 年才改名芬利。作为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他接受过非常正规的教育。1927 年,在他刚过 15 岁生日后不到一个月时,便以优异成绩从叙拉古大学心理学专业毕业。他最初的意图是从事法律,因此大学毕业当年就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习公法,两年后获得硕士学位。当他发现法律并非自己所好后,放弃了一个大公司法律部的工作,转而参与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的编写工作,后转向研究社会学、经济学,吸收了马克思、韦伯(Max Weber, 1864—1920)、布彻尔(Karl Bücher, 1854—1943)等的理论。在此期间,他完成了自己的博士学业,在著名古史学家威斯特尔曼(William Linn Westermann, 1873—1954)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古代雅典土地和信用研究(公元前 500 年至公元前 200 年)》,并陆续发表书评和论文,同时开始在纽约城市学院任教。在 20 世纪 30 年代芬利为数不多的著述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他对导师威斯特尔曼有关古代奴隶制著作的评论。威斯特尔曼以研究纸草文献起家,专长是希腊化和罗马时代的埃及,主张详尽研究古代有关史料,从中爬梳出有用的史实。芬利则认为,虽然这样做确实可以发现众多的史实,但缺乏真正的理论思考,而且对众多基本问题缺少综合。或许因为两人理论和方法上的差异,当芬利亟需帮助时,尽管威斯特尔曼在学术界享有崇高地位(一度担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而且颇为欣赏学生的才华,却并未施以援手。而芬利在自己后来的著述中,也不免对导师的著作施以恶评,甚至称后者的《古代希腊罗马奴隶制》为“学术上的灾难”。

20世纪30年代德国法西斯上台,美国法西斯运动兴起,芬利协助人类学家博阿斯(Franz Boas, 1858—1942)等著名学者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争取学术自由运动,可能还参与了美国共产党的活动。在此期间,他研习马克思主义,并与左派知识分子接触密切。二战期间,他在援助苏联部工作。战后,他一度入拉格斯大学任教。但因为他30年代的活动,在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高潮中,芬利和他的众多同学、同事一道受到调查,妻子玛丽也受到牵连。指控他的人中,包括《东方专制主义》的作者魏特夫(Karl Wittfogel, 1896—1988)。此人1938年曾受芬利夫妇招待,在芬利家中长期逗留,此时却倒戈一击,指控芬利组织共产主义活动。1952年12月,芬利被拉格斯大学解聘。1954年,在经历近20个月的失业后,芬利接到了英国剑桥大学伸出的橄榄枝,与妻子玛丽愤而移居英国,行前卖掉了他们心爱的福特车,而且明确向朋友表示不大可



能再回美国。此后,他一直在学术氛围友好的剑桥大学任教,而且确实很少回美国。1962年,芬利正式成为英国公民;1970年,他接替著名史学家琼斯任剑桥大学古代史讲席教授;1979年,他因为自己杰出的学术贡献,受封为爵士(在英国古史学家中,这是少有的殊荣)。值得一提的是,芬利堪称婚姻生活的典范。他与妻子玛丽相识于哥伦比亚大学,1932年结为连理。移居英国后,玛丽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但芬利一直不离不弃地照顾她。1986年6月22日,在料理完妻子的丧事后,芬利回到寓所,四小时后因脑出血陷入昏迷,次日去世。^①

芬利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古代希腊史,但他的著作更多的是以整个古典世界为研究对象。自1953年出版《古代雅典土地和信用研究》以来,他写了大批著作,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奥德修斯的世界》、《古代与现代的民主》、《历史的使用与滥用》、《古代经济》、《古代奴隶制与近现代意识形态》、《古代世界的政治》、《古代史》、《古代希腊人》以及一批高质量的论文,还主编了《古代社会研究》、《罗马财产研究》、《古典世界的奴隶制》等著作,成为战后最有影响的



^① 有关芬利早年生活和学术的资料主要来自 Daniel P. Tompkins, "The World of Moses Finkelstein: The Year 1939 in M. I. Finley's Development as a Historian", in Michael Meckler, ed., *Classical Antiquity and the Politics of America: From George Washington to George W. Bush*, Waco: Baylor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95—126; 王敦书、周爱平:“一代古史名家 M. I. 芬利和他的史学方法”,载王敦书:《贻书堂史集》,中华书局 2003 年版,第 445—455 页。

古史学家之一,许多观点至今仍被西方学者奉为正统。^①大致归纳起来,芬利在古代史领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古代经济、古代奴隶制以及古代世界的政治。

古代经济

尽管近代对古代经济的研究早已开始,经济作为古代历史一部分的重要性,在 19 世纪初的博克(Auguste Böckh, 1785—1867)那里也已经得到初步阐释,但将经济发展作为古代历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从经济的变化来解释古代历史变迁,应当始自 20 世纪初的迈耶(Eduard Meyer, 1855—1931)和贝洛赫(Julius Beloch, 1854—1929)。不过两人都是历史循环论者,把古典世界与近代西欧的历史进行了不恰当的类比,将近代话语和模式不加区别地应用到古代世界。他们在古代发现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商人和工厂主;古代世界的一切成就,都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成就;而古代文明的衰落,被归为以皇帝为首、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

^① M. I. Finley, *Economy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Brent D. Shaw and Richard P. Saller,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81, pp. 312—318 已经编辑了芬利 1979 年之前的主要著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这里不再列举。1979 年以后出版的主要著作包括 *Ancient Slavery and Modern Ideology*, expanded ed., Princeton: Markus Wiener Publishers, 1998 (1st ed., 1980); *The Ancient Economy*, updated e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1st ed., 1973); *A History of Sicily*,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86; *Democracy Ancient and Modern*, revised ed.,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5 (1st ed., 1973); *The Use and Abuse of History*, London: the Penguin Books, 1990 (1st ed., 1975); *Politics in the Ancient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Ancient History: Evidence and Models*,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85 等。



消灭了古代世界的资产阶级。尽管历史循环论忽视了人类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但它毕竟提出了一套解释古代历史的模式,而且适合了当时正面临西欧工人运动冲击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需要,在古史学界一度广为流传,并成为 20 世纪前期最有影响的潮流。

然而,这种历史观的弊病早已为学界洞察。韦伯在其一系列著作中已经指出,与中世纪城市比较,古代城市为消费城市,是战士俱乐部;古代的人是政治动物,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政治和社会地位,而非经济自身。近代的城市是生产性城市,市民因其作为生产者获得市民资格,其追求财富的动机,也是出于经济原因。古代与中世纪或者近代的差别,是本质而非数量。然而韦伯的论证并未获得古史学界认可,20 世纪前期唯一使用韦伯理论解释古代希腊经济的德国史学家哈斯布鲁克(Johannes Hasebroek, 1893—1957),因为各种原因在教学和学术生涯中遭遇了双重失败,似乎暗示了韦伯理论在古史学界的命运。

战后比较系统地批评古史现代化派的古史学家,是芬利在剑桥大学的同事琼斯(A. H. M. Jones, 1904—1970)。他否认希腊人和罗马人统治东方时期城市获得了广泛发展;所谓的城市化,不过是将原来的某些乡村划归城市,其他一切如故。他关于罗马帝国政府和经济的论文,用更加具体的史料证明,即使在罗马,共和时代国家的收入也主要来自战利品和掠夺,上层阶级的剩余财富几乎完全投向土地;帝国时代,虽然和平有利于贸易,但税收体系又加剧了贫富分化,导致社会购买力下降和市场狭小,因此古代的贸易和市场都相当有限,且主要限于奢侈品。在有关雅典民主政治的讨论中,他指出雅典人的大多数是拥有土地、家资中等的小所



有者,少有公民成为商人。就国家的政策论,公民和国家主要关心的,是消费而非生产、进口而非出口;对于所谓的市场,雅典人基本是视而不见。因此,“某些现代学者在雅典政策中读出的商业动机,并将雅典和科林斯的敌对归于对市场的争夺。这类看法,我得承认,是相当非历史的。”“要说雅典人关心商人们在哪里出卖他们由雅典购买的商品,根本没有证据。”^①琼斯的这些看法,在很多方向预示了芬利和原始派的观点。

芬利的《古代经济》正是在吸收韦伯、哈斯布鲁克和琼斯已有成就的基础上,从理论和模式上对现代化派古史学发动冲击的力作。与现代化派不同,芬利将整个希腊-罗马世界视为一个整体,而且是与近代经济发展序列不相连续的整体。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个世界的范围,从时间上说约当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500年,从空间上说,则有一个从巴尔干半岛一隅到囊括整个地中海的发展过程。由于这个世界与近代世界迥然不同,“我们需要寻找不同的概念和模式,它们适合古代经济,但不(或者不必然)适合我们的经济。”^②他承认,在如此之长和如此广大的时空范围内,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经济形态,但仍有理由将其视为一个整体,因为它是一个以农民和农业为基础,而且政治上属于罗马帝国的单一地区,具有共同的文化-心理模式。这个社会的主要居民是农民,在他们那里,等级和地位而非阶级是关键因素,土地是最为重要的财富。这个主要由农民构成的世界,其社会和经济史首先是乡村的历史,农

^① A. H. M. Jones, *The Athenian Democrac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57, pp. 95—96.

^② M. I. Finley, *The Ancient Economy*, pp. 27—29.

民的历史。这是一个家庭占据首位、几乎所有人都以经济上的自足为目标的世界。贸易一般规模狭小,并且多为短途贸易,大多数财富来自租金和税收机制。商人和工业家发财的十分稀少,而且在他们确实发财时,也渴望将他们的所得投资于土地。古代存在经济变化,尤其是在罗马帝国,土地稳步地集中到越来越少的人手中,但几乎说不上有经济增长。古代也确实存在城市,但大多数城市规模有限,一般很难超过当地农产品能够供养的范围。罗马那样的大城市是例外,它们总是需要进口粮食以供养它们的公民,所以甚至是帝国盛期的罗马,真正的城市人口也从不曾超过总人口的5%。而且即使是这样少数的大城市,也都是作为消费中心而非生产中心,是依靠自然资源或者剥削周围的乡村兴起,其基础是租税和政治权力,而非经济。因此,将希腊-罗马文明称为城市文明明显属错误。城市对乡村的微弱兴趣,在于它们从那里能够获得充足的粮食。除保证粮食供应外,古代国家(即使曾经存在)也少有我们可以称为国家经济政策的东西。

芬利将古代经济置于与近代经济完全不同的时空框架中,创造了一个有关古代经济“能动的、合乎逻辑的体系,它的终结不是因为内部矛盾,而是罗马社会结构与边境上日益增长的外来压力之间的相互作用”;^①经济置身于社会之中,对地位的关注,既限制了古代的技术进步,也限制了富人利用穷人劳动力的可能,将获利的动机驱逐到社会的边缘,因此,古代人致富的手段不是通过经济途径,而是通过税收、贡金和租金等非经济手段。对贡金和土地的



^① Ian Morris, "Foreward", in M. I. Finley, *the Ancient Economy*, p. XXI.

追求,造成了古代社会对战争和帝国的狂热。正因为古代置身于社会中的经济完全不同于作为独立自主实体、可以独立进行研究的近代经济,那么,将近代经济学概念应用到古代经济的分析中,无异于缘木求鱼,所以,芬利“既拒绝这种概念,也拒绝这种理路”^①。

芬利将希腊与罗马等量齐观、视古代经济为一个整体的做法,引起了古代经济史学界的巨大争论。支持者恰当地认为,古代世界的主要居民是农民,土地是最为重要的社会财富,也是投资的主要渠道。贸易和手工业即使存在,也无足轻重。他们从多个方面将芬利的观念具体化。加恩西(P. D. A. Garnsey)指出,粮食贸易在古代无足轻重,无论是雅典,还是罗马,都主要靠自己的土地满足基本的需要。萨勒(Richard P. Saller)试图证明,古代经济的所谓增长,哪怕是所谓50%这样看似很大的增长,在技术基本停滞的条件下,是在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时间中取得的,如果平均到每一年,则不过0.1%甚至更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邓肯-琼斯(Richard Duncan-Jones)在他关于罗马帝国时代经济的著作中尝试用具体数据估算罗马经济的总量和发展程度。他从文献和碑铭资料中建立起来的罗马经济总图景,包括粮食产量、价格的变化、人口的变化等,多少印证了芬利的结论:“罗马经济仍是一种原始的体系,我们也许有理由将罗马帝国视为‘发展中’国家。人口的大部分几乎都从事相对低水平的农业,制造业依靠落后的技术,几乎不曾被组织在大的单元中。尽管有综合性干道网络,但陆上交通仍如此昂贵和低效,以至于经济不可能用其他地区储存的粮食

^① M. I. Finley, *The Ancient Economy*, p. 34.

缓解内地的饥荒。非常广大的地区货币的统一和较低的关税可能鼓励了海洋商业的增长,但长途贸易的大宗乃是奢侈品和政府物资,而非用于大众消费的便宜货。船速缓慢,且在冬天禁止航行。不曾发展起有效的信用体系,银行不多且是小规模的、孤立的机构。用现代标准来看,对于一个人口达到 5000 万之众的国家来说,其国民生产总值可能极其低下。”^①

芬利模式的批评者也不少。批评者的路径大体可以划分为三类:芬利对史实的选择性使用,古代经济的增长以及贸易与商业的作用。第一类可称史实派,批评芬利故意忽视或者曲解了古代的资料,或以偏概全,有意省略了古代经济中的某些现象。在 1975 年发表的有关《古代经济》的长篇书评中,弗里德里克森(M. W. Frederiksen)指出,芬利过于专注理论和模式,而他构建的模式和理论主要来自韦伯。但韦伯的模式意在解释近代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关注的也都是近代经济中存在、但在古代经济中似乎并不存在的方面,如经济理性化和对利润的追求、新式会计和复式记账方法、技术进步和职业专门化等。可是过于关注现代经济的这些方面,有曲解古代史料的危险。^② 芬利否认古代存在经济增长的看法,也遭遇诸多批评。在希腊史领域,斯塔尔(Chester G. Starr)的《早期希腊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已经指出,公元前 800 年至公元前 500 年间希腊世界人口的增长、大批神庙建筑的出现,表明当时

^① Richard Duncan-Jones, *The Economy of the Roman Empire: Quantitative Stud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1—2.

^② M. W. Frederiksen, "Theory, Evidence and The Ancient Economy",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ol. 65 (1975), pp. 164—171.



的经济确实有增长。大多数罗马史学者承认,至少从罗马共和国中后期开始,罗马的经济有所增长。继芬利担任剑桥大学古代史讲席教授的霍普金斯(Keith Hopkins)从再分配经济的角度来解释罗马经济的增长。在他看来,随着罗马统一地中海地区,罗马共和国后期与帝国初期的经济,因为帝国总人口的增长,也由于长期的和平,还有帝国赋税体系的需要,形成了以罗马城为中心的统一市场,罗马城犹如整个地中海经济的加速器,以它为中心,出现了一个卫星城网络。这些城市卷入了为罗马城进行的生产并与罗马城贸易。经济的一体化和贸易的发展,人口向城市的流动,让帝国内不同阶层的居民都从中受益。他的结论是:罗马经济确有温和的增长以及一定程度的货币化,尽管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帝国的税收和租金,而非技术进步或者经济总体的腾飞。对理解罗马经济来说,霍普金斯的模式对原始派有某种程度的修正,即承认古代经济有一定程度增长,但其增长模式不同于现代经济,因此赢得了不少支持者。

现代化派并未因为芬利而销声匿迹,却以新现代化派的面貌重提古代工商业的重要性。他们力图强调古代经济确有发展,市场、货币等现代经济学概念,完全可以应用于古代经济的分析,并从商品货币关系的作用、城市在古代的地位等方面,试图消解芬利模式的有效性。麦金莱(David J. Mattingly)和萨尔蒙(John Salmon)主编的《古典世界的非农经济》中,作者们试图从商业、采矿、建筑、纺织等多个领域,证明它们在罗马行省乃至整个帝国经济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使用“生产型的过去”来称呼希腊-罗马世界的经济,并论证罗马帝国实现了经济的温和增长。在



帕金斯(Helen M. Parkins)主编的《罗马的城市化——超越消费城市》中,不少作者并不赞同将古代城市一律视为消费性城市的论点。她与史密斯(Christopher Smith)主编的《贸易、商人和古代城市》中,更将挑战芬利的原始派模式作为根本任务。该书值得注意之处,一是放大古代世界的眼界,将古代亚述都城阿淑尔和希腊化时代的埃及纳入讨论范围,强调商业在古代经济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二是作者大多可能被视为现代派。他们征引包括西塞罗、普林尼等在内的古代文献,证明贸易和商业对罗马和地中海地区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并利用新的沉船考古资料,对公元前125年至公元175年间地中海地区的贸易量进行具体描述和估算,从而证明商品货币关系在古代罗马确实扮演着关键角色。莫勒(Neville H. Morley)的《大都市与腹地》曾引起学术界广泛注意。它以公元前后各200年的罗马与意大利为背景,讨论大都市的罗马对意大利经济的影响。他开宗明义地宣布,虽然罗马是个消费性城市,但不代表它是寄生性城市。他搜罗了大量文献和考古资料,力图证明罗马城、郊区及意大利其他地区实际上是一个相互依赖的经济整体,至少在农业生产中,农民们会根据实际需要调整种植策略,因此经济理性同样存在于古代。所谓的糊口经济之说,不免低估了意大利农业繁荣的程度。最近出版的鲍曼(Alan Bowman)等主编的论文集《计量罗马经济——方法与问题》借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对有关古代经济的争论进行了回顾,并且希望利用新的考古资料,对罗马经济的多个方面进行具体的分析和讨论,把罗马经济史建立在更加坚实的理论 and 史实基础上,为形成新的综合做准备。在该书的导论中,同样出现了在芬利著作中不太

